



兩岸的困局與出路

◎李英明

從開放探親以來，兩岸關係一直在政治敵對而非政治領域交流的弔詭悖論狀況中發展著；如今非政治領域的交流程度已到了會促動雙方政治關係或產業經濟關係產生結構性變化的地步。亦即兩岸關係已從量變轉為質變，正式告別開放探親以來的初級階段，向新的階段轉折，而初階段留下了不少問題正在向兩岸領導人的智慧進行挑戰。

由於兩岸政治上的敵對關係，使兩岸之間的互動一直沒有真正有效的規則，可被雙方所遵循。再加上由於長期國共互動關係中，中共缺乏信譽，台北不太相信北京會信守承諾，為防止非正式領域交流的量質變效應的衝擊，台北在經濟領域中就對特定規模的經濟互動採取了戒急用忍的政策。在台北看來，北京已把台商的大陸經濟活動當作籌碼，並且通過以商圍政或在國際領域中孤立台灣等途徑，要迫使台灣走入按北京邏輯來解釋的「一個中國」原則的陷阱之中。就北京來看，「一個中國」原則應該成為兩岸政治互動的真正規則；但就台北來看，除非各自表述，否則這個原則只是北京企圖加諸於台灣的緊箍咒。

橫在兩岸關係的最大問題，不只是無法建立真正有效的互動規則；還包括就算有些規則存在也缺乏制度上的強制手段可以迫使北京來遵守規則，而台灣也沒有足夠力量可以防止北京

違背諾言。其實，以兩岸關係的現實來看，要使兩岸互動不會經常充滿張力，是需要有獨立於台北和北京之外的外部強制力的存在，通過外部制裁的威脅來增加違規行動的潛在代價；同時，還必須建立一種檢驗違規行為以及懲制違規者的機制。但是，外部強制力的建立可能就意謂著兩岸問題的國際化，這是北京所反對的。北京在這個向度上，也陷入相當嚴重的悖論情境之中，一方面反對兩岸問題的國際化，可是另一方面又企圖藉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環境來逼迫台灣就範。因此，北京自己把兩岸問題不斷國際化但卻批評台北搞國際化動作。

國際政治當然是現實主義當道，在一方面願意而且能作為兩岸互動有利的外部強制力者其實不多；但另一方面只要台灣在國際經濟地位的份量夠甚至不斷攀升，台灣就可以擁有國際戰略地位，從而吸收國際社會戰略性的關注，這可以為台灣創造許多潛在的國際戰略空間，進而成為制約北京的潛在外部強制力。

兩岸問題在結構本質上本來就是國際政治問題，這是不管兩岸內部不同族群想法如何都存在的現實。不過，這個問題的複雜性遠超出國際政治領域中有關各造所能想像的範圍之外，因為它牽涉到兩岸週遭國家，美俄以及歐洲共同體和其他國際社會成員和兩岸間的複雜戰略關係；這其中尤其觸及後冷戰國際政經秩序的

◎本文作者為政大東亞所教授。



重組問題；北京做爲一個新興的強權，國際社會一方面當然會按現實主義原則來處理兩岸問題；不過，台灣幅員雖小，但卻擁有巨大的經濟力量以及無法漠視的地緣政治戰略地位，因此，國際社會在另一方面又同樣會從現實主義原則出發，不希望北京輕易拿走台灣，影響國際政治戰略形勢的巨大變化。北京和台灣的角力互動，其實是雙方國際戰略地位和角色的競爭。

兩岸問題的複雜性其實也早就超出北京的想像之外。面對複雜萬端的形勢，北京還是走一貫的「原則論」的途徑，不斷強調所謂「一個中國」原則，甚至在許多場合中，還會說要按所謂「一國兩制」來拿走台灣。「一國兩制」用來處理九七後的香港問題都將會捉襟見促，更何況是用來處理兩岸問題；「一國兩制」被北京用來處理兩岸問題，充滿了反歷史和不尊重現實的特性，而北京迄今仍抱著它，這充分顯露北京在兩岸問題上的霸權心態。而在這種霸權心態背後也暴露出北京處理兩岸問題的能力其實已然不夠，因此必須用相當化約的「原則論」的途徑來概括一切，或者就像前年那樣使用文攻武嚇的手段。

台北的戒急用忍政策，顯示出台北對北京的霸權心態和不信守諾言的政治疑慮。由於政治上的敵對和疑慮，加上北京的霸權心態，北京基本上一直想把兩岸關係從原來可以呈現非零和的狀態導向零和，結果使得兩岸關係停滯甚至出現嚴重張力，陷入博弈理論所稱的囚徒困

境之中。要打破這種困境，套句感性的話就是要重建雙贏的機制；但是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進行新的制度化的安排，使兩岸之間有對兩造都各具約束力並具有懲戒機制的真正原則的存在。而要達成此目標，就如前述，台灣必須繼續強化提昇其國際戰略角色，以國際社會作爲對北京的外部強制的籌碼。

由於台商和台資到大陸的經商和投資，兩岸經濟出現了某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但是，由於政治上的敵對，這種互賴關係反而更引發兩岸的政治疑慮，深怕這種互賴被轉變爲單向的依賴；台北的戒急用忍反映了這種疑慮，而北京對台商的查稅行動以及種種優惠措施的逐步取消也反映了這種疑慮。

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大陸不少沿海省份或城市對外經濟的依存度不斷攀升，對外貿易額在地方GDP總額中的比例不斷提高，外國自然可以運用這種途徑來影響大陸各地方甚至北京的決策。而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和貿易額不可謂不大，可是多年來都是在隨機狀態中以零亂的方式來進行；因此，並無法形成集中優勢來影響中國大陸地方甚至北京的決策；到頭來，如果兩岸關係再出現嚴重張力的話，台商和台資就有可能成爲人質或無法退還的質押品。台北的戒急用忍政策當然也反映了對這種可能形勢發展的憂慮。

在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投資貿易額很大，進而對各級政府的決策有影響力，這是相當自然的邏輯發展；可是，台北卻囿於種種內政的囚



素，無法掌握這種形勢發展，實在可惜。這也使台北和北京互動競爭時陷入悖論情境：對大陸有著巨大的投資和貿易額，可是卻無法擁有有效的可以影響或制衡大陸各級政府的槓桿。就因為這種悖論情境，使台北必須較為單向的往國際社會尋求影響或制衡北京的槓桿或籌碼；從而引發到底外交政策或大陸政策重要的爭論。

用，以擴大自身在國際社會的戰略角色。 ◎

台灣的政黨政治已然形成，政黨輪替的現象正在進行；對北京而言，是進入一個新的對話和談判對象相當不確定或浮動的階段；面對這種形勢的發展，北京有可能在今年特別是其人大開會或柯林頓訪北京後先和台北恢復談判，先起個頭，以免日後情勢變化後更難掌握；此外，北京當然有可能再觀望，等待台灣高層政情更加明朗化後再有所行動。

在另一方面，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又重建了天安門事件之後的關係正常化，甚至也建立了所謂戰略關係，這當然是雙方關係改善的象徵；但這也是雙方關係由盛轉衰，開始要出現新的張力的時候。北京是個相當神經敏感的政權，既希望和華盛頓建立合作關係，但又害怕合作轉為對美的政治和戰略依賴，從而在大陸內部形成更大的親美力量，影響北京的自主性。而華盛頓和北京建立所謂戰略夥伴關係，這並不新鮮，早在八〇年代中期就進行過，只不過因為天安門事作遭到挫折；此番華盛頓的政策作為，其實也反映了對北京潛在的戰略威脅的反制。台北應該精切瞭解這種情勢，並善於運